

穿越想像的异邦 布衣日本散论

刘柠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穿越想像的异邦 布衣日本散论

刘柠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越想像的异邦：布衣日本散论/刘柠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8

ISBN 978 - 7 - 308 - 06996 - 0

I. 穿… II. 刘… III. 日本 - 研究 IV. X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114 号

穿越想像的异邦：布衣日本散论 刘柠著

责任编辑 赵 琼

文字编辑 杨苏晓

装帧设计 丁 丁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77 千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6996 - 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目 录

转身的日本：“大国化”的途中

- 和平宪法一甲子，志在必改？ / 3
- “小泉剧场”谢幕，近乎完美的背影 / 10
- 日本版 NSC：首相官邸“白宫化”的重要步骤 / 17
- 日本离核国家有多远？ / 21
- 日美同盟有“隙”？ / 27
- 福田访美：蜜月同盟的拐点？ / 31
- “价值观外交”何以超越国家利益冲突 / 36
- 东亚一体化：谁主沉浮？ / 40
- 日本幢幢谍影的背后 / 47

现状的日本：从容与焦虑

- “活力门”骚动的背后 / 53
- “赛先生”：酷日本的软实力 / 56
- 日本城建进入环境生态学时代 / 61
- 走向民生大国：21 世纪日本的生存之道 / 64
- 与阪神大地震有关的两个问题 / 71
- 日本的恶心 / 75
- 派阀：自民党政治的秘密 / 78
- “下流”，怎么了？ / 84

日本“下流社会”何去何从 / 88

“大国化”焦虑下的舆论环境

“命令放送”与报道自由 / 97

自由媒体何以成为战争协力者 / 102

出版史良心记录 / 107

何谓新闻记者 / 112

日本出版的四种“神器” / 115

日本杂志“变局”背后的社会涵义 / 119

新闻界与政治 / 129

历史中的日本：何以超越？

激荡的百年史，现实的掌舵者 / 139

宰相中曾根：日本政治大国梦的教父 / 146

金大中事件：让历史问题的解决去政治化 / 150

要同盟，还是要参拜？ / 154

靖国问题“软着陆”与美国因素 / 158

漫长的战败 / 164

日本“右翼”的思想传统与组织流变 / 169

宫泽喜一：“55年体制”的终结者，还是牺牲者？ / 177

东亚历史与东亚史观 / 180

超越“超越日本的激情岁月” / 186

超越误读

中日有多远 / 191

对华强硬的背后 / 195

假如中国失去日本 / 199

历史认识超越国境的困境 / 203

在救亡中启蒙，以启蒙图存 / 207

“高陶事件”旧话重提，盖棺之论尚待时日 / 210

作为文化的日本

东洋魔女，欲说还休 / 221

日本的传统有多厚 / 225

日本艺伎：一个窄而幽深的世界 / 229

《叶隐闻书》、武士道及其他 / 236

哈“不良” / 245

我跑，故我在 / 249

日本漫画：冷酷仙境的冒险 / 252

漫画·动漫·宅男 / 256

日本人到底爱不爱撒谎 / 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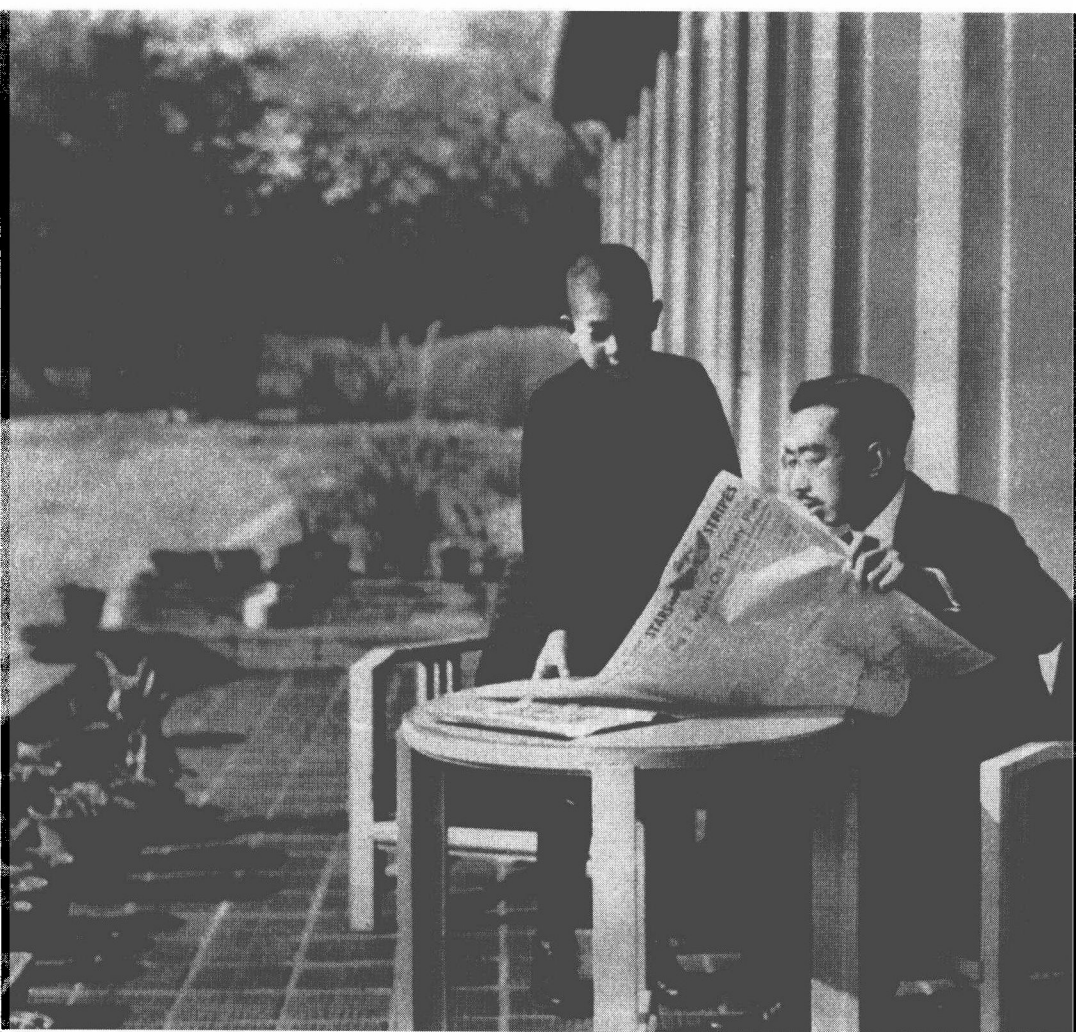
服饰的表情 / 262

知日当如李长声 / 265

日本人为什么不喜欢《蝴蝶夫人》? / 268

后记 让善意的批评成为中日关系的增殖因子 / 278

转身的日本：“大国化”的途中



“和平宪法”让天皇走下神坛，“人间天皇”裕仁父子在阅读联合国占领军机关报《星条旗报》。

和平宪法一甲子，志在必改？

2007年5月3日，日本的宪法纪念日，是现行的“和平宪法”实施60周年的日子。60年一甲子，一部身世奇特的宪法风雨兼程地走过，虽未经任何修改，但核心部分却被空蚀，呈空心化——日本宪法正站在21世纪的十字路口：改，还是不改？是一个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日本社会展开了空前的论战。正值国民纷纷涌出家门、踏上海外之旅的黄金周，各大主流媒体推出与此相关的报道、社论、民调连篇累牍，给人一个总的感觉：改宪问题已到了须臾不可放置的节骨眼上。

何谓“和平宪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随后，美军对日本实行了长达7年的军事占领。作为美对日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废除基于天皇总揽统治权的《明治宪法》，制定一部从制度上根除历史旧恶、“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法成为当务之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责令盟军司令部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领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尽快草拟出宪法草案，并提出了制宪三原则：第一，天皇的权力和义务由宪法予以规定，天皇对人民的基本意志负责；第二，放弃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权力，日本不但要放弃作为解决纠纷手段的战争，也要放弃作为自卫手段的战争，把防卫事务委托给“左右世界的崇高理想”；第三，废除封建制度，除皇族外，华族权利只限于本人一代，不保留任何

特权。

惠特尼准将不负所望，很快拿出了宪法草案，于1946年2月13日交付日本政府“检讨”。日本政府对于以象征天皇、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为主体的宪法草案，表示难以接受。而美占领当局则考虑抢在2月26日国际“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将宪法既成事实化，避免委员会成立后插手制宪事宜。因此，以高压手段逼迫日本政府接受，限期48小时内作出答复，并威胁说，如不接受草案，占领当局将单方面向日本国民公布。在这种情势下，日本政府只有表示原则接受。在议会审议之后，于1946年11月3日以《日本国宪法》的名义颁布，并于次年5月3日起实施。可以说，日本是在接受美援的脱脂奶粉和压缩饼干的同时，被迫接收了“和平宪法”。某种源于被“强加”的郁闷和反弹，构成了战后一直绵延至今的改宪思潮的主调。

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出于对冷战的应对和反共的战略需要，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最初的彻底打碎战争机器的“非武装化”、“民主化”，跳跃到后来重新有限度地武装日本，从而埋下了后者对战争历史问题认识模糊、反省不彻底的病根，而前者“首鼠两端”的政策权宜性，也为日本战后不同时期形形色色的“改宪派”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依据。

何以是现在

日本作为东西方冷战最前沿的桥头堡，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左、右翼思想尖锐对立，各种政治势力的论战此起彼伏，而所有这些“左”与“右”的思想交锋，本质上几乎都能以“护宪”与“改宪”为线索贯穿起来。这并不是说，战后的日本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化社会，但这两种思潮的博弈是如此的激烈、持久，乃至其他的声音都湮没无闻了。

事实上，自“和平宪法”颁布、实施以来，“改宪”的论调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不仅如此，其间还几度形成高分贝的动议，甚至酿成严重的社会性事件。1970年11月25日，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率领4名“盾会”（由三岛弟子组成的、效忠其个人的准军事化右翼团体）成员

闯入陆上自卫队营地，绑架东部方面总监益田兼利，召集千余名自卫队士官宣读“檄文”，呼吁改宪，发誓用血和生命来捍卫“日本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最后愤而切腹自戕，以唤起“国民精神”的觉醒。事件发生，举世震惊。“三岛由纪夫现象”成为日本国内长久的话题，而事件本身，则成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社会思潮的分水岭——从那以后，“改宪”一度成为禁忌。

对宪法问题，日本战后历届内阁，几乎都采取回避策略。继在安保斗争中下台的岸（信介）政权之后上台的池田勇人曾公开声明，“在自己（首相）任内不修改宪法”。其后，直到小泉内阁为止，前后18任首相，无一例外，都曾做出过类似的表态——首相任内不轻言改宪，成了永田町约定俗成的惯例。

首先打破这种“惯例”的，是安倍。而安倍的政治基因，则来自其毕生尊崇的外祖父岸信介的遗传。作为不折不扣打着改宪牌上台的政治家，安倍从不掩饰其政治保守色彩，谈到宪法问题时，言必称“摆脱战后体制”，这与其在太平洋战争中当过阁僚，1957年作为自民党总裁出任首相后创设“宪法调查会”，始终为改宪而不懈奔走的外祖父半个世纪前念兹在兹的“占领后遗症的根绝”、“真正独立的恢复”等话语简直如出一辙。

不过，即使安倍，也深知改宪之水甚深，不仅需要广泛的民意支持，而且要应对居高难下的法律门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就。连能让自民党乾坤翻转的政治强人如小泉者，也只是从释法入手，先把兵派出去，然后再试图从舆论上政治正确化，但却始终未触碰程序性法案。

而安倍上台未久，便动议被视为“改宪手续法案”的《国民投票法案》出台，实际上等于启动了改宪的预备程序。就在其2006年当选自民党总裁之初，安倍还曾从容地对海外媒体表态说：不惜以两届连任的时间来谋求实现宪改的目标。其能否如愿以偿地成功连任另当别论，但彼时的安倍显然是把宪改作为6年的中长期目标来考量的，并不像后来那样焦虑。那么，安倍何以在宪法问题上变得如此狂飙突进了呢？

答案只能从其政权支持率的变化上寻找。作为以70%的高支持率登场的明星政权，安倍显然没能做到“细水长流”。从2006年底，11名“造反”党员的复党问题开始，舆论审视安倍的视线变得严峻起来。

经过事务所经费等“政治与金钱”的丑闻和不止一名阁僚的失言丑闻之后，离心力增大，安倍开始迅速走背，支持率跌破40%。

而作为史上最年轻首相，安倍不仅自视甚高，而且对上台以来的业绩颇有几分自得：修正《教育基本法》、重估道路特定财源、防卫厅升省……自付无一不是小泉政权求之而不得的正果。但遗憾的是，日本国民并不买账，他们觉得改革在后退。

在这种情况下，把原本留着“善终”的牌——改宪，先拿来应急便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了。毕竟，在2007年7月的参院选举中，如果自（民）公（明）两党的席位跌破半数的话，作为执政党总裁的安倍是要承担责任的。虽然从法律上，下院（众院）选举似乎更为重要，但历史上因上院（参院）选举失利而引咎辞职的首相为数不少，近者便有宇野宗佑^①、桥本龙太郎^②等。

宪改的动因

毋庸讳言，20世纪90年代以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目标和战略定位的调整，日本社会对改宪已基本脱敏，各种民调结果和舆论表明，宪改的社会、政治基础日趋成熟。

日本打破“和平宪法”的禁忌有一个过程。尽管改宪的诉求是内发式的，但主要动力则源自外部刺激，并与该法的“始作俑者”美国密切相关。

第一次转机是1991年海湾战争。应美方要求，尚未趟入后来“泡沫经济”的泥淖、经济繁荣正如日中天的日本，独自承担了130亿美元的巨额战费，协助美国打赢了战争。战后，科威特政府特意在《纽约时报》斥巨资刊登鸣谢广告，一长串被感谢的国家中，硬是没有Japan。

① 宇野宗佑（Sosuke Uno, 1922—1998），滋贺县野洲郡出生，神戸商科大学（现神戸大学）中退，日本政治家。1989年6月2日，继竹下登出任第75代首相。因性丑闻加上此前的“利库路特事件”和引入消费税的影响，在同年的参院选举中，自民党遭遇结党以来的惨败，宇野引咎辞职，在任仅69天。

② 桥本龙太郎（Ryutaro Hashimoto, 1937—2006），东京都人，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日本政治家。1997年1月11日，继村山富市出任第82代首相。因金融改革不力，翌年7月的参院选举，自民党惨败，桥本内阁总辞职。

这使日本深受刺激，痛感徒有钞票、为人埋单难以在国际社会立足，要想赢得人家的尊重，就得流汗，甚至不惜流血。一时间，主流媒体上充满了对海湾战争的“反思”、批判，战时责任者海部（俊树）内阁的做法被舆论奚落为“支票外交”，“国际贡献”作为关键词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化”。

不破不立。这场刺激的结果，导致了日本对“和平宪法”禁忌的破题：1991年4月，日政府向波斯湾派遣扫雷艇——这是战后日本自卫队首次踏出国门。继而，翌年，国会出台《联合国维和活动协力法》（“PKO法案”），自卫队开赴柬埔寨，从法律上为军队在“外国领土”活动打开了一道“非常门”。对此，日本政府所持的法理依据是，“只要不与武力行使混为一体，便不违宪”。

此乃日本以释法手段谋求突破宪法瓶颈之始。此后如法炮制，越走越远。9·11之后，为配合盟国美国的全球反恐，不仅其海上自卫队的军舰驶向印度洋，陆上自卫队的足迹甚至到了戈兰高地和伊拉克战场。

如果说海湾战争是日本战后安保拐点的话，那么，12年后的伊拉克战争则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重要转机。众所周知，伊战是一场合法性备受质疑的战争：美布什政府以查找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为由开了战端，一场恶仗的结果，却是武器没找到。但即便是对于这样大义缺失的战争，日本也出于盟国的“义务”积极参与，并乐于提供海、陆、空全方位的配合。

小泉政权后期，日本已把驻扎在萨马沃市，从事战后复兴支援活动的陆上自卫队全部撤出了伊拉克。如今，虽然航空自卫队仍然在从事战争物资的运输服务，但按照事先的约束，始终没碰过武器弹药。如约派出，如期撤回，未折损一兵一卒，不仅给布什撑了面子，还成了小泉津津乐道的“政绩”。

在这里，宪法第九条再次体现了“安全阀”的作用：假如没有这一条的约束，或日本的释法功能过度发挥，突破了这一法律瓶颈的话，一个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是日本会被要求“全面协力”，从而深度裹进战争泥淖，像英国似的难以自拔。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九条是日本既履行盟国义务，而又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应对空间的唯一担保。

但虽说如此，随着中国的崛起，出于防范、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

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势必会更加深化，日本也会被要求承担更多、更重的“国际义务”（除了经济的，还有军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宪法确实对日本掣肘、捆绑过多，妨碍其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诉求的表达。

解铃还需系铃人。然而吊诡的是，战后美国加诸日本的两样东西（“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解除“敌国”武装，防范其“江湖独走”的初衷，一个成了日本拼命挣脱的“紧箍咒”，另一个则演变为美挟日以对外的利器。

宪改：改什么

过去15年，日本在不对现行宪法伤筋动骨的前提下，以高度的现实主义灵活性，硬是把释法空间推到了边界，乃至宪法的核心已被掏空。目前，作为宪改的一环，安倍授意成立的战略学者班底，正在加紧探讨集体自卫权行使的可能性。“法律上保有，却无法行使”局面的终结很可能是时间的问题。

众所周知，“和平宪法”的核心，其实就是第九条，即所谓“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的约束。这不仅是日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事实上也成为战后和平主义理念最大的思想资源。主权从天皇让渡给国民，公民社会的价值深入人心；男女平等，同享选举权；无论提出何种主张，信仰何种宗教，都无关“治安维持法”，不会被课以“不敬罪”；战后60年，无一人死于军力之下，甚至公民的身份证都没有编码，只记录最基本的个人信息（姓名、出生年月日、居住地等），以防被国家机器“恶用”于征兵、劳工等“战争装置”……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不可谓不彻底，这也是在支付了最昂贵、最惨痛的代价后所得到的唯一回报。用2007年3月辞世的日本著名小说家城山三郎（Saburo Shiroyama）的话说：“通过战败，我们只换来了一部宪法。”

诚然，就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害的宪法功能而言，“和平宪法”确乎有其局限。对此，有舆论指责国家为什么不能向国民提供免于做他国“国家犯罪”（如朝鲜绑架日本人质）的牺牲的保护；2006年夏天，在北方四岛附近的根室冲海域，日渔民被俄罗斯人射杀，却未能得到俄方

的道歉和赔偿，也令某些人士对宪法产生“幻灭感”。

但是，任何宪法、法律都有其适用边界，无边无涯的“普遍法”反而是可疑的，是百无一用的代名词。这本是常识性问题，无需解释。现行宪法实行60余年，其精神实质已深深植入日本社会，与现代国家公民社会的价值融为一体。我们理应看到：那种在战前、战时的日本，国会审议某个法案，当台下的议员向在台上解说的军部官员提出质疑时，会遭“住口”的呵斥，审议会结束，提问的议员会被罢免，甚至逮捕的事情在今天的日本是难以想像的；反体制作家、学者因著文批评政府或某个高官，而被“特高”^①便衣警察请去喝咖啡的情景已然绝迹；正因为有了宪法第九条的保护，越战时，日本没有被要求像同为美国盟国的韩国那样参战，得以专心发展经济；在硝烟尚未完全消散的战后伊拉克，日本维和部队之所以能不损一兵一卒，完璧归国，成为政治家口中的莲花，也是拜第九条“过滤”之功……应该说，战后日本能有60年和平建设的实绩，成为和平主义的策源地、大本营，拜“和平宪法”及第九条所赐矣。

这也是在今天的日本，“改宪派”已占多数、“改宪”基本上已成“政治正确”的情况下，主张改可以，但第九条不能动的声音仍然十分强大的理由；恐怕也是最大的“改宪派”安倍虽然力主改宪，通过改宪谋求建设一个“美丽国家”，而对于到底如何改，其所憧憬的“美丽宪法”究竟为何物却始终失语的原因。

^① “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恶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从战前到战中，镇压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反体制的言论、思想、宗教和社会运动，维持社会稳定。战后被废除。

“小泉剧场”谢幕，近乎完美的背影

造势舆论有穷时，盖棺小泉没商量。距离小泉“退阵”，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小泉及其政权便已经被日本国内外媒体盖棺定论了N次。在日本历届首相中，蒙传媒如此“厚爱”者，恐怕并不多见。自民党总裁选举翌日（2006年9月21日），这个被称为“怪人”的首相通过电子杂志向5年半以来始终支持其改革的国民郑重道别，“常言道有德者无才，有才者寡德，而我只是一介文弱、普通的‘常识者’。但尽管如此，却常被什么东西庇护，兴许是运气好吧……”这份创刊于2001年6月，旨在直接与国民建立沟通的首相府电子刊物，每周四更新，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共发行了4.5亿份，盛期时的订阅量达227万份。

2006年9月初，《读卖新闻》发表了关于战后首相评价的网上民调结果：小泉以41%的得票仅次于得票44%的吉田茂，位居“伟大首相”的第二位，超越了田中角荣（36%）和中曾根康弘（30%）。笔者注意到，对小泉的评价，越接近谢幕，越呈长势：战后60周年之际公布的民调结果，位居第二位的还是田中角荣。

应该说，这确乎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情理之中的评价。日本学界在解读日本当代史时有一个说法，叫战后“两次崛起”，说的就是从美军轰炸后的瓦砾上崛起和从“泡沫经济”的废墟上崛起。作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十字路口，两次都关涉设定什么样的国家战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重大主题。前者，“轻军备、重经济”的“吉田路线”让日本以牺牲部分主权为代价换来长久的安全保障，在经济上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战后复兴，并一路坐成了经济大国；后者，小泉力主“小政府、大社

会”，打碎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拆分“巨无霸”国有机构邮政省，借与布什的私交，强化军事同盟，并以之为平台，把自卫队首次派到了海外战场，极大地推进了日本梦寐以求的“普通国家”化进程，把“总保守化”的政治资源与面向 21 世纪的国家战略目标结结实实地“链接”到了一起。前者，作为冷战时期的国家战略，其成功实施已然为战后 60 年日本和平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后者，作为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选择，在时间上刚刚进入过去时，后续效应尚待观察，“成功”与否，似乎还不到作价值判断的时候。但是，对于一个深刻改变了日本及其对外关系的政权，在它落下帷幕的时候，我们不妨回眸一望。这一望未必看得很远、很深，但求能看清它走过的足印，或许有助于理解小泉 5 年“光影交错”的改革和由此而生的 21 世纪日本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生态及其走向。

“总统型”首相的政治秘诀

日本前首相、自民党最大派系“森派”掌门人森喜朗曾有微词，说小泉有张“非自民脸”。意思是小泉完全无视自民党传统派阀政治的“打招呼”、“调整”、“平衡”等玩法，不按党内既定游戏规则出牌。其实，森此言差矣：高喊“把自民党砸个稀巴烂”而上台的小泉，其政治上的胜利根本就是“反党”的胜利，用被视为其“接班人”的安倍晋三的话说，小泉是自民党“创造性的破坏者”。

应当承认，在日本战后历届首相中，小泉无疑是那种为数极少的具有“卡理斯玛”（Charismatic）式个人魅力型领导人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其一头狮发、不苟言笑，给人以酷感的做派，更与其身上的一些迥异于传统日本政客的个人品质有关。譬如，说话干脆利落，绝少闪烁其词，拖泥带水；敢作敢当，勇于承担责任；思想开放，大胆任用女性官员；趣味脱俗，喜爱艺术，等等。假如在欧美社会，这些或许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但是在封闭、保守、有诸多长老社会遗留的日本政坛，说风格清新，实不为过。尽管作为政治家，小泉的所作所为确有作秀的嫌疑和成分，但这种“秀”，却不是一般政客能做得出来的，其背后也多少透出人的某种性情、胆识：如乘海上自卫队军舰视察北方四岛，雾霭茫茫的海上，一个手持望远镜的身影定格在周刊的封面；面对带伤参赛，终于胜